在细微之处可以证实的东西，当各种情况在更大范围表现出来的时候就更容易加以说明了，相反，如果只作极其一般的考察，就会令人怀疑所得出的结论究竟是否在每一个别场合都能得到证实。（马克思）

无产阶级为了夺取政权需要民主的形式，然而对于无产阶级来说，这种形式和一切政治形式一样，只是一种手段。

    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一八八四年三月），《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一九六二年版第四一二页

假如无产阶级不能立即利用民主来实行直接侵犯私有制和保证无产阶级生存的各种措施，那末，这种民主对于无产阶级就会毫无用处。

    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一八四七年十月底～十一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三六七页

马克思主义解决民主问题的方法，就是进行阶级斗争的无产阶级利用一切民主机关和反资产阶级的倾向，为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和推翻资产阶级做好准备。

    列宁：《答皮·基也夫斯基（尤·皮达可夫）》（一九一六年八～九月），《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第十五页

在有限的自然里，必然性表现为相对的必然性，……而相对的必然性只能从实在的可能性中推演出来，这就是说，存在着一系列的条件、原因、根据等等，这种必然性是通过它们作为中介的。……偶然是一种只具有可能性价值的现实性，而抽象的可能性则正是实在的可能性的反面。实在的可能性就像知性那样被限制在严格的限度里；而抽象的可能性却像幻想那样是没有限制的。实在的可能性力求证明它的客体的必然性和现实性；而抽象的可能性涉及的不是被说明的客体，而是作出说明的主体。（马克思）

影象是自然物体的形式，这些形式好像一层外壳，从自然物体上脱落下来，并把自然物体移到现象中来。事物的这些形式不断地从它们中流出，侵入感官，从而使客体得以显现出来。因此，是自然在听的过程中听到它自己，在嗅的过程中嗅到它自己，在看的过程中看见它自己。所以，人的感性是一个媒介，通过这个媒介，犹如通过一个焦点，自然的种种过程得到反映，燃烧起来形成现象之光。（马克思）

【哲学自我意识的二重性】（1）当哲学作为意志面向现象世界的时候，体系便被降低为一个抽象的总体，就是说，它成为世界的一个方面，世界的另一个方面与它相对立。体系同世界是一种反思的关系。……它的内在的自我满足和完整性被打破了。本来是内在之光的东西，变成转向外部的吞噬一切的火焰。于是，得出这样的结论：世界的哲学化同时也就是哲学的世界化，哲学的实现同时也就是它的丧失，哲学在外部所反对的东西就是它自己内在的缺点，正是在斗争中它本身陷入了它所反对的缺陷之中，而且只有当它陷入这些缺陷之中时，它才能清除这些缺陷。与它对立的东西、它所反对的东西，总是跟它相同的东西，只不过具有相反的因素罢了。

（2）个别的自我意识始终具有一个双刃的要求：其中一面针对着世界，另一面针对着哲学本身。……这些自我意识把世界从非哲学中解放出来，同时也就是把它们自己从作为一定体系束缚它们的哲学中解放出来。（马克思）

对神的存在的证明不外是对人的本质的自我意识存在的证明……当我们思索存在的时候，什么存在是直接的呢？自我意识。在这个意义上说，对神的存在的一切证明都是对神不存在的证明，都是对一切关于神的观念的驳斥。……谁觉得世界是非理性的，因而谁本身也是非理性的，对他来说神就存在。换句话说，非理性就是神的存在。（马克思）

也许为了造成一种改善的假象而不从本质上去改善事物，才需要把制度本身的客观缺点归咎于个人吧？虚伪自由主义的手法通常总是这样的：在被迫让步时，它就牺牲人这个工具，而保全事物本身，即制度。这样就会转移从表面看问题的公众的注意力。对事物本身的愤恨就会变成对某些人的愤恨。（马克思）

如果严肃的意思应当是注重实际的严肃态度，那么……我把可笑的事物看成是可笑的，这就是对它采取严肃的态度；对不谦逊仍然采取谦逊的态度，这也就是精神的最大的不谦逊。（马克思）

一个人，只有当他与之发生关系的他物不是一个不同于他的存在，相反，这个他物本身即使还不是精神，也是一个个别的人时，这个人才不再是自然的产物。但是，要使作为人的人成为他自己的唯一现实的客体，他就必须在他自身中打破他的相对的定在，即欲望的力量和纯粹自然的力量。（马克思）

（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一个是怀疑主义者，另一个是独断主义者；一个把感性世界看作主观假象，另一个把感性世界看作客观现象。把感性世界看作主观假象的人注重经验的自然科学和实证的知识，他表现了进行实验，到处寻求知识和外出远游进行观察的不安心情。另一个把现象世界看作是实在东西的人，则轻视经验，在他身上体现了在自身中感到满足的思维的宁静和从内在原则中汲取自己知识的独立性。但是还有更深的矛盾。把感性自然看作主观假象的怀疑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从必然性的观点来考察自然，并力求解释和理解事物的实在的存在。相反，把现象看作实在东西的哲学家和独断主义者到处只看到偶然，而他的解释方法无宁说是倾向于否定自然的一切客观实在性。在这些对立中似乎存在着某种颠倒的情况。

但是很难设想的是，这两个处处彼此对立的人会主张同一种学说，而他们毕竟看起来是互相紧密联系着的。（马克思）

哲学家在他所规定的世界和思想之间的一般关系中，只是为自己把他的特殊意识同现实世界的关系客观化了。（马克思）

德谟克利特认为是真实的那种知识是没有内容的，而能向他提供内容的知识却没有真实性。……据说德谟克利特弄瞎了自己的眼睛，以使感性的目光不致蒙蔽他理智的敏锐。（马克思）

的确，有一种老生常态的真理，说发生、繁荣和衰亡是一个铁环，一切与人有关的事物注定包含于其中，并且必定要绕着它走一圈。……发生、繁荣和衰亡是极其一般、极其模糊的观念，要把一切东西都塞进去固然可以，但要借助这些观念去理解什么东西却办不到。死亡本身已预先包含在生物中，因此对死亡的形态也应像对生命的形态那样，在固有的特殊性中加以考察。（马克思）

“自由市场”模型建立在一系列有关个人行为的预设之上，其核心是：消费者在有限预算的约束下为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而作出“理性选择”，从而构成对货品和劳务的需求；生产者为了获得利润的最大化而作出“理性选择”，从而构成了货币和劳务的供应。上述两个方面的互动决定了市场价格，成为消费者与生产者的“理性”竞争行为的唯一参照系。因此，市场的运作不仅被看作是个人寻求利益的自然现象，而且也被理解为“理性”选择的结果。在这里所谓“经济人”和“理性人”的预设总是从个别行动者开始，因而要论证“寻利”的自然动机，就必须把个人从社会关系中分割出来。而历史中的“自由市场”模型究竟怎样呢？许多经验研究已经证明：各种生产要素的不完全自由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核心，卡尔•博兰尼（Karl Polanyi）就驳斥了那种认为19世纪资本主义乃是中世纪以来市场活动持续扩张的自然结果的观点，他指出，英国从商业化的重商主义社会转变为市场社会，既非不可避免，也不是自然进化的结果，全国性市场的出现恰恰是由于国家有计划的重商主义政策，亦即某些建国策略的副产品。如果允许市场机制成为宰制人类命运、自然环境和购买力大小的唯一力量，社会就会趋于毁灭。（汪晖）

庸俗“自由主义者”经常越过哈耶克对实证主义社会理论和古典经济学的批判，把他对各种集体主义经济学或社会主义经济计划的批判性剖析转化成为对市场秩序的合法性论证。他们关心的仅仅是为资本主义秩序辩护。这些“自由主义者”所以能够如此庸俗地利用哈耶克的理论，部分地应该归咎于这一事实：尽管哈耶克对自然/人为的二元论有着明确的认识，对实证主义进行了批判，但他并没有能够彻底地清理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社会、社会/国家、市场/计划的二元论，没有提供理解市场形成和计划模式形成的历史分析。但是，在哈耶克与他的某些中国信奉者之间作出区分是完全必要的。在当代中国的庸俗讨论中，这些“自由主义者”以批判传统社会主义为掩护，用各种古典经济学预设论证现实的市场范畴及其不平等结构的合理性。正是在这种精心营造的历史迷雾中，他们不仅复活了那些甚至已经被哈耶克本人所摈弃的古典经济学前提（如经济人的预设），而且也在英国经验主义的旗号下恢复了实证主义的权威性以及原子论的个人观。他们意识到社会的自我保护运动包含了破坏市场运行法则的可能，因而将之归结为违背“经济人”或“理性人”规范的“民粹主义”，却没有意识到新的社会冲突正是市场制度扩张的结果。（汪晖）

恩格斯提出唯物辩证法的三条规律，即量转化为质和质转化为量、对立的相互渗透、否定的否定的规律。列宁肯定了这三大规律，同时强调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实质与核心。斯大林只论及量变质变和对立统一规律，既没有提否定之否定，也没有谈核心问题。毛泽东则提出唯物辩证法只有一个对立统一规律，其余都是范畴。对立统一规律是基本规律，量变与质变，肯定与否定都是对立统一规律制约下的范畴。毛泽东的论述反映了他对唯物辩证法体系与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不同的理解和建构。

“自由派的虚幻”：相信自由来自对权力的削弱。自由的真正保障在于“权力的良好组织”。自由首先是能集权威、稳定和民主于一身的“保护框架”。

在罗桑瓦龙眼里（见罗桑瓦龙：《法兰西政治模式》），传统学术界对法兰西政治模式的理解以托克维尔的描述为经典代表，属于一种旧的阐释，其突出特征之一在于，他们采取的是一种静止的社会学方法，符号化地将法国政治模式锁定在雅各宾专制主义的固化指认上：法兰西政治就是激进主义的或革命民主主义的雅各宾一元模式。这种对法国政治的托克维尔式的定性，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托克维尔经典描述中的法国则是原地踏步、没有历史，被套上了激进原则的紧箍咒。”

“三分法”是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提出的：“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是人们的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这里包括：（甲）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乙）由此产生的各种不同社会集团在生产中的地位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丙）完全以它们为转移的产品分配形式。”斯大林明确地把所有制规定为生产关系的一个方面，并决定着其他两个方面。从而就使得所有制成为可以脱离生产、流通和分配而存在的独立的概念，实际上也就是把所有制简单地等同于生产资料的归属。但是马克思却说，“政治经济学不是把财产关系的总和从它们的法律表现即作为意志关系包括起来，而是从它们的现实形态即作为生产关系包括起来。”生产、流通、分配等总和为所有制；生产形式、交换形式、分配形式都是所有制的现实形式。斯大林认为所有制就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三分法”之所以错误，因为它将法律上的承认当作现实的生产关系的基础，以所有权这个法学概念代替现实关系的现实形态，即政治经济学的所有制形态。实际上，没有脱离生产、流通、分配等关系的“所有制”。如果仅仅从生产资料的归属上划分，可以划分为归属个人与归属于大家这两类，前一类是私有，后一类是公有。但同样是公有制如何来区分原始公社、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国营经济还是将来的劳动者联合体？同样是私有制，又怎样判定是奴隶占有制、封建土地所有制还是资本所有制？所以，政治经济学在说明所有制关系的本质的时候，不能只从生产资料的归属出发，而必须分析劳动者与生产的物质条件的结合方式。当劳动者不能参与决定生产、交换、分配整个过程时，所谓“公有”“全民所有”其实只是一种虚幻的形式！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列宁）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常识告诉我们，政党和国家一样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一切政党，都是具有阶级性的。党性是阶级性的集中表现。从来没有什么非阶级的、超阶级的政党，从来就不存在不代表一定阶级利益的所谓“全民党”。（《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篡夺了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在苏联社会上出现了一个资产阶级特权阶层。苏联社会上的特权阶层，是由党政机关和企业、农庄的领导干部中的蜕化变质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构成的，是同苏联工人、农民、广大的知识分子和干部相对立的。这个特权阶层，思想上已经完全蜕化，完全背离了布尔什维克党的革命传统，抛弃了苏联工人阶级的远大理想。他们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社会主义。他们自己背叛革命，也不准别人革命。他们唯一的考虑，是如何巩固自己的经济地位和政治统治，他们的一切活动，都以特权阶层的私利为转移。（《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

现代社会是个竞争的社会，竞争就是比赛，比赛首先意味着大家都只能玩某个共同的游戏，而不能玩各自的游戏，当然，现代社会有自由，从理论上说，你可能自己玩自己的游戏，但是由于大多数人不和你一起玩，所以你的游戏在“社会”这个大游戏中就变成了失败的游戏，结果你还是不得不参加集体游戏。现代的自由就是人们自由地选择了不自由的结果，这样就彻底地否定了生活的多样性。其次，比赛又意味着必须赢，否则就什么也没有了，生活于是变得非常残酷，在现代社会，这种残酷不一定表现为物质的剥夺，更多的时候是表现为生活意义或个人价值的剥夺，即一旦失败就会使生活变得没有意义；进而，比赛还意味着越来越疯狂，显然，如果不想办法创造更加疯狂的成绩，发明更疯狂的比赛方式，就一定会被淘汰。比赛是现代社会的原罪。（赵汀阳）

如果一个民主社会同时是个商业社会，那么民主就非常可能会变成伪装的民主，因为财富能够买断人心，至少能够买断信息和宣传而买断人心，还有能力操纵各种事情，所以商业民主社会的真正选票是钞票。而在国际问题上，民主甚至还可以用来超越民主，比如说一个最民主的国家的人民可以为了他们的最大利益而民主地决定消灭另一个国家。这时，“内部的民主”就转换成了“外部的独裁”。（赵汀阳）

哲学家斯宾塞说：“没有人能完全自由，除非所有人完全自由；没有人能完全道德，除非所有人完全道德；没有人能完全快乐，除非所有人完全快乐。”开火车出身的美国劳工领袖戴布兹（Eugene Victor Debs），因参与政治反抗，被判十年，关在牢里。由于他极富人望，虽在牢里，却得到美国大选中，一百万选民对他戏剧性投票。一九二一年，哈定总统特赦了他。他在一九一八年六月十六日，在法庭上，曾从斯宾塞的句子里，说出这样的千古名言——

　　While there is a lower class I am in it.

　　While there is a criminal elements I am of it.

　　While there is a soul in prison I am not free.

　　只要有下层阶级，我就同俦；

　　只要有犯罪成分，我就同流；

　　只要狱底有游魂，我就不自由。（李敖）

列宁多次强调过，生产资料收归国有或国有化，并不是生产资料的社会化；他指出，向社会化过渡，要求对所有的生产资料进行系统的统计和监督，并由社会控制对生产资料的使用。他还指出，这种统计、监督和对社会的使用都只有当劳动人民自己来做时才能真正地存在。（贝特兰）

大部分苏维埃领导人特别强调苏维埃国家的“官僚主义”的特性，或者说“带有官僚主义毛病”。这些人和那些人从这个特性中得出不同的实际结论。对有些人来说（如斯大林），这种官僚主义性质基本上是一种随着教育的发展而消失的文化特点，这种文化特点，在清除行政、经济机关中最“官僚化”的分子过程的同时，有可能部分地被消灭。对另一些人（如托洛茨基）来说，国家机器的官僚主义特点（其“错误”必须“克服”），基本上与俄国生产力的低水平有关，这些特点只有在生产力充分发展时才能消失。（只要俄国在经济上还没有充分发展，就应该继续按照“资产阶级法权”来分配）。1923年，托洛茨基的这种观念尚未很清楚地肯定，然而在以后几年里就迅速明确起来。

对几乎整个布尔什维克党及其领导人来说，“官僚主义”和“带有官僚主义毛病”等词起着代替阶级分析的作用。因此，对这种现象的斗争似乎首先不属于阶级斗争的范畴，而纯粹依靠生产力的发展、教育或镇压。（贝特兰）

“战时共产主义”在最深刻的意义上已失败，那并不是因为它造成了一些“经济困难”，也不是因为人们还没有“具备足够的力量”而是因为它不能像人们先前曾相信的那样变革经济关系，所以这就是说人们受到了政治和法律关系的表面束缚，认为以此能够把社会生产关系“局限”在这种政治和法律关系方面，并错误地把社会主义所有制，即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法定所有制和一些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等同起来。（贝特兰）

恩格斯多年致力于使群众和党员了解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阐明的反对国家主义的论点。对于这篇文章的发表，他很晚才得到德国党的领导人的同意。稍后，他又设法删掉了爱尔福特纲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草案中重新提出的国家主义观点。被通过的草案声明社会民主党同所谓“国家社会主义”没有丝毫共同之处，“国家社会主义”是把国家放在私人企业主地位，“从而把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的权力集中于一手之中。”（贝特兰）

1922年8月，斯大林拟定了一项名为“自治化”的决议草案。草案规定一些独立的共和国将作为“自治共和国”，事实上也就是附属国，包括在俄罗斯联邦内。斯大林的草案还规定俄罗斯共和国政府、它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将成为各国共同的政府。这些提案取消了其他苏维埃共和国的独立性，遭到白俄罗斯和格鲁吉亚的党中央委员会的反对。乌克兰的党中央委员会没有进行讨论，但它的委员们都表示不赞成。

9月26日，列宁看到了这个草案，谴责了把其他共和国加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原则，他建议建立一个共和国的联邦，各共和国之间享有平等的权利。

主张把其他处于从属地位的苏维埃共和国纳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内的人们，试图对列宁的批评置之不顾。斯大林不等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听取列宁的意见，就把自己的草案交给了他们。他甚至在政治局专为这个问题而召开的会议上宣称“对列宁应表示坚决的态度”：他在9月27日的一封信中，竟然说列宁在这件事上表现了“民族自由主义”。

中央委员会在1922年10月6日的会议上，最后通过了稍作修改的斯大林的草案。这个文件仅仅在形式上考虑到列宁的某些意见，如“联邦”一词代之以“联盟”，但具体的措施实际是确保大俄罗斯领导权。

列宁在既成事实面前，考虑到1922年10月6日的决定具有极端的严重性，他决定在他自己的立场，同中央委员会在混乱的情况下，也就是说在没有充分了解争论的情况下所采取的立场之间，划出一条明确的界限。在他看到中央委员会的决定的当天，他就写信给加米涅夫，他在信中写道：“我宣布同大国沙文主义进行决死战。”……从1922年10月底起，列宁的口授记录、书信、日记中不断提到他对布尔什维克党站到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立场方面，也就是站到资产阶级立场方面的危险性的分析。他谴责大国沙文主义，并着重指出从此需要一种有利于弱小民族的“不平等”，以抵偿弱小民族遭受到的大民族的不平等。（贝特兰）

1918年1月15日，斯大林在全俄工农兵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有关民族问题的报告，他在指出了资产阶级在夺取政权的斗争中利用“民族习惯”之后，接着说：“这一切表明必须把（民族）自决原则解释为该民族的劳动群众的自决权，而不是资产阶级的自决权。自决原则应当是争取社会主义的手段，应当服从社会主义的原则。”……在第八次党代表大会上，列宁在捍卫党的赞成各民族的自决权的传统立场上，开始是孤立的。列宁说明了“自决权归工人阶级”是一个错误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仅适用于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已经出现分裂的地方。他指出自决权应给予